

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分析*

宁越敏

摘要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本文在评述了人口流动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成因和特征。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看,两个原因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一是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二是城乡差异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因此,需要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上制定合理措施,有序地疏导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作者 宁越敏,男,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获理学硕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上海 200062)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中国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出现的新现象。中国的人口流动具有社会和空间双重转换的特征,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内地人口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其结果使沿海城市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出地和人口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业已产生重要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

一、人口流动的理论评述

在人口流动的理论研究中,刘易斯最早提出农村人口转移的模型^[1]。刘易斯认为,不发达经济的特征是二元结构,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导部门,也只有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和费接受了二元结构的观点,但他们认为刘易斯没有看到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2]。一般把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称之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麦茜认为,如果把上述理论延伸,那么人口区际流动就是由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所引起的。相对资本而言具有劳动力禀赋的地区工资水平较低,而具有资本禀赋的地区工资水平较高,由此导致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流向高收入地区^[3]。

托达罗从个人决策的微观角度提出人口流动的又一解释^[4]。他认为区域发展差异是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但对个人而言,是经过迁移的成本—效益计算后才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在这里,成本包括旅行费用、找到工作之前维持生活的费用等等,效益则不仅仅包括较高的收入,也包括发挥自己的潜力。他认为,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则农村人口就向城市流动。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331010)资助。

斯塔克和布罗姆提出移民的新经济学解释^[5]。该理论强调移民是由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迁移不仅是为了获得预期收入,同时也为了使家庭收入的风险最小,因此区域间的收入差异不是人口迁移的必要条件。即使区际收入差异缩小,由于其他市场(资本、保险市场等)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农村人口仍然会向外迁移。由此导出的政策是,政府不仅需要缩小区际发展水平的差异,还需要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这样才能减少人口流出的数量。

以上理论都是从城乡差异角度探讨农村人口流出的原因,派尔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人口流入地对低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产生人口流动的原因^[6],其最重要的观点是工资不仅反映了劳动力的供需条件,也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各种职位构成一个等级体系,一旦提高最低工资以满足这一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必将产生连锁反应,产生工资的结构性膨胀。因此,发达地区才从低收入地区引进劳动力以满足低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果把这一理论引伸的话,发达地区引进低级劳动力,有利于提高竞争力,还可以控制通货膨胀。

中国学者对农村人口迁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陈吉元等人认为城市收入高和农民失业率高分别形成同方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农民进城^[7]。辜胜阻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农村—城镇人口迁移模式,但可简化为乡城推拉力模式^[8]。他认为中国农村由于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联产承包制,农村推力较小,中国的人口迁移模式是拉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各种观点从不同侧面研究了人口流动问题,为认识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但中国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必须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去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为此,我们在农村人口主要流入地之一的上海作了多方面调查,以期探讨8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的成因。

二、上海市流入人口分析

50年代,中国为了在实施迅速的工业化战略时保持城市社会的稳定,采取了划分城乡人口的户口制度。在户口制度下,除入学(大、中专)、参军等少数情况外,农村人口一般难以进入城市。1978年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长期掩盖的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其中一部分就地转化,另一部分流向城市寻求生路,数量与日俱增。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流入人口急剧增加。据1993年上海市流动人口第五次抽样调查显示,全市流入人口达281万^[9]。流入人口占上海户籍人口的比例从6.3%上升至8.4%,再上升至19.4%。

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看,流入人口的成因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 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

人口集聚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集聚的结果。据估计,目前在上海从事正式非正式工作的外来人口约154万,占外来人口总数的55%,很明显,如果上海不存在巨大的外来人口就业市场,外来人口的数量不可能大幅度上升。但是,外来人口就业市场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事实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上海也存在着城市失业人口。据统计,1994年上海城镇失业人口达14.85万人,待工人员27.12万人^[10],二者合计达42万人,实际失业率达7.9%。在自身存在较多失业人口的情况下,上海仍然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市场。说明现阶段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对外来人口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第一,沿海地区率先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对外开发开放,吸引了国内外资本大量集聚在上海,推动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形成外来劳动力的巨大市场。

80年代初,中国沿海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在南方,上海市的流入人口数量不多,1984年仅70万,占常住人口的5.81%,且流入人口中从事就业的比例极低,只占6.63%。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流入上海的人口日益增加,1986年增加到165万。1988年上海流入人口的数量虽降至141万,但经济型流入人口比例上升至61.41%。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了上海浦东新区对外开发开放政策,使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热点,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也使劳动力市场急剧扩大,流入人口数量增至281万,其中外省及海外流入人口251万。表1反映了上海流入人口数量的增加与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加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从事金融、贸易、房地产、研究与开发等工作,他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有助于上海形成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城市。如浦东新区自对外开放以来,已吸引中央各部委、外省企业1800多家,在这些企业中的外省市从业人员有2万余人^[11]。又如,在沪经商的海外人士亦有近万人。以这些人士为主形成了上海外来人口的高级劳动力市场。

表1 上海市流入人口与投资的增长

	1984	1985	1986	1988	1993
流入人口(万)	70	134	165	141	281
经济型流入人口比例(%)	6.63	-	22.95	61.41	75.5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92.30	118.56	146.93	245.27	653.91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	1.48	2.86	13.22	31.75

资料来源:流入人口资料引自王午鼎主编: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表1-2,表1-4,投资数据引自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1987、1989、1994。

但是,在上海的大多数外来人口从事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或低级服务业,其中因房地产大规模开发引来的外省建筑队伍占全市外来就业人口数的一半,达70-80万人,而1988年时的建筑施工队伍人数仅29.4万。这表明,上海外来人口劳动力市场与基本建设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第二,本地劳动力结构老化,经济发展需要外来青壮年劳动力。

上海自196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实行一孩化政策,使上海成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与此相应出现了劳动力年龄的老化。1982-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6.6%下降到63.9%,而青壮年人口(20-34年)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由50.7%下降到45.9%。按1990年常住人口推算,1993年上海人口的优势年龄组为30-44岁,人口平均年龄为35.5岁,而外来人口的优势年龄组为20-29岁,占总数的42%;年龄中位数是26.28岁^[12]。根据我们对上海市区外来就业人口的抽样调查,18-30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7.34%,31-40岁的人数占25.28%。在乡镇企业中,外来人口18-30岁年龄组占的比重更高。所以,上海劳动力结构的老化使上海进一步提高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例如,纺织厂40岁以上的女工中有很多人下岗,但一线工作岗位缺乏本地劳动力补充,只能招收外来青年女工。在造船、环境卫生、饮食等行业出于同样原因也大量使用外来民工。另外,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事家庭帮佣的外来人口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农村乡镇企业,同样存在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产生的使用外来人口务工的现象。

第三,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场所。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但由于所有制的不同,乡镇企业用工制度比较灵活,加上乡镇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等原因,使乡镇企业(包括乡镇中的各类私营企业)成为吸引外来劳动力的重要场所。据上海市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在私营单位工作的外来劳动力占 26.9%,乡镇企业占 8.3%^[13]。实际上,乡镇企业用工要多得多。上海农村务工劳动力 120 万人,乡镇企业职工达 142 万人,多余的 22 万人基本上来自外省市。在上海市持有务工许可证的 50 多万人中,估计郊县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用工要占到近半数。有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乡镇使用的外来劳力高达数千人,甚至一家企业就雇佣外来劳力 1500 人。因此,上海郊区农村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外来劳动力就业市场。

由于上述原因,上海已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就业市场。这一市场可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为从事管理、技术工作的人才市场,为吸引这部分外来人才,上海市制定了蓝印户口政策,持有蓝印户口可享受上海常住户口的待遇;但更为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是属于本地人不愿从事的重体力劳动或低级服务业。根据上海市劳动局 1990 年的调查,外来劳动力中 35% 的人从事脏、累、苦及有毒、有害工种,另有 20% 是建筑工、房修工、30% 从事各种低收入的辅助劳动^[14]。我们在市区对外来人口职业的抽样调查也显示,经商、采购、经理人员和个体户仅占总数的 13.5%,绝大多数人从事建筑、务工和低级服务业(表 2)

表 2 上海市区外来人口就业抽样调查

工种	人数	%	工种	人数	%	工种	人数	%
务工	28	10.9	建筑	52	20.2	采购	5	1.9
经商	11	4.3	清洁工	23	8.9	经理	5	1.9
经营蔬菜	16	6.2	矿工	0	0	个体户	14	5.4
饮食	14	5.4	宾馆	4	1.6	探亲访友	4	1.5
保姆	6	2.3	机关	6	2.3	找工作	3	1.1
缝纫	39	15.1	文化	1	0.4	其他	27	10.5

对外来人口收入的调查显示,年收入 2000 元以下者占 3.7%,2000 - 4000 元者占 38.3%,4000 - 6000 元者占 29.2%,6000 元以上者占 28.8%。1994 年,上海职工的年均收入 7401 元。因此,外来人口大多属于中低收入者。由此可见,城市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低级劳动力市场,而这一市场只能由外来人口来补充,并由于上海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老化及一孩化政策使得上海对这一市场的需求更为迫切,规模也更大。

2. 城乡差异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

从劳动力供需关系看,城市低级劳动力市场如果离开了内地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加入也是不可能形成的,城乡收入差异无疑是农民流入城市的推力。然而在中国,由于户口制度实施的结果,城乡差异不仅仅反映在收入方面,也反映在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的水平以及退休或失业的生活保障等方面。因此,城乡多方面的差异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我们对外来人口来源地户籍和迁移原因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

在上海市区所作的 300 份问卷结果显示,来自江苏的人最多,占 39.6%,其中又有 70% 来自苏北;安徽和浙江居其次,分别占 17.3% 和 16.2%;再次是四川、福建、江西、山东,分别占 4.5%,3.4%,2.6% 和 2.6%。其他人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及西北、东北等地。来自大城市的

仅一人,且随父母工作调动来上海。

城乡接合部是外来人口集聚的地方。在普陀区桃浦镇李子园村居住的 760 个外来人口中,江苏人 363 个,占 47.8%;浙江人 162 个,占 21.3%;安徽 121 个,占 15.9%;山东、江西、福建各 26 人,均占 3.4%;其余来自西南、中南、西北等地。

郊县青浦县徐泾镇某玩具厂 257 名外来人口中,来自安徽的有 108 人,占 42.0%;江西 74 人,占 28.8%;苏北 31 人,占 12.0%;河南 22 人,占 8.6%;四川 8 人,占 3.1%;其余来自湖北、陕西、浙江、山东。

由上可见,上海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华东地区,特别是毗邻上海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空间距离和传统的联系决定了外来人口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分析显示,外来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农村或小城镇,上海市区的外来人口中 74.38% 的人属于农业户口,只有 22.73% 的人属于非农业户口(2.89% 属未定户口)。在郊县乡镇企业打工的外来人口则几乎全部属于农业户口。

问及市区外来人口迁移的原因,认为本地提供收入较高的工作、本镇生活条件较好,以前的地方没有就业机会分别占 20.8%、15.4% 和 9.7%;想转为城镇户口、城镇居民政治待遇较高分别占 6.6% 和 2.3%。以上 5 个原因合计占 54.8%,再考虑到外来人口大多来自农村,反映了城乡差异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

从 70 年代末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然而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大多数省农村人均耕地仅 1 亩多,甚至不到 1 亩,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世界市场的水平,继续提高困难很大,这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安徽省为例,改革初期的 1978-1980 两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81.7%;1980-1985 五年间增长一倍;1985-1993 八年间才增长 96.1%,其间通胀 75%,实际收入仅增加 20% 左右,全年收入仅相当于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表 3)。从各地区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的比较看,沿海地区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纯收入增长较快,从而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1980 年,安徽农民纯收入为上海的 46.5%,1994 年下降至 28.3%,而绝对差距从 212.5 元增加至 2463 元。沿海各省市间农民纯收入的差距相对较小,如江苏省与上海市的这一差距在 15 年中基本不变,浙江省与上海市的差距则有所减小。但如果考虑到苏南农村经济的起飞拉高了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那么苏北与上海之间的差距也是扩大的。因此,经济较落后地区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异强烈地推动农民进城谋求新的生路,而收入差异小的地区如苏南、浙江进入上海的流动人口就少得多。

表 3 若干省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较 元

地区	1978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4 /1980 (%)
上海	290.00	397.35	805.92	1907.32	2003.38	2225.87	2726.98	3436.61	864.9
江苏	152.10	217.94	492.60	959.06	920.72	1060.71	1266.87	1831.53	840.4
浙江		219.18	548.60	1099.04	1210.77	1359.13	1745.94	2224.64	1015.0
安徽	101.70	184.82	369.41	539.16	446.05	573.58	724.50	973.20	526.6
江西	140.70	180.94	377.31	669.90	702.53	768.41	869.81	1218.19	673.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5》280 页。

城乡差异不仅表现在由于户口制度所形成的人口再生产方面的差异,如医疗、子女教育、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就业安排、住房分配等,还表现在观念、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一部分

外来人口迁徙的原因是为了想转为城镇户口(占抽样调查数的 6.6%)和羡慕城镇居民政治待遇较高(占 2.3%)。

城乡差异从宏观上解释了促使农村人口迁移的原因,而解释个人的迁移决策则需考虑微观理论模型,特别是要探讨家庭决策在个人迁移中的作用。如果人口流动是为了降低家庭收入的风险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流入人口的返回性迁移,季节性迁移,全家迁移比重低,或往家中汇款等现象。从我国情况看,家庭决策模型有一定适用性。80年代我国农村出现的“亦工亦农”现象实际上就是降低风险的一种表现,农民在进厂务工的同时,保留自己的一份口粮田,这样便能维持自己最起码的生存保障。又如春节过后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高峰,很重要原因是农民利用农闲时期进城打工以赚取额外收入。而我们对流动人口是否往家汇款的调查中,90%以上的人表示定期往家中汇款,或在年底时一次性携款回家过年。由于这一原因,使尽管进入上海的农民大都来自经济较落后地区,但仍有一部分来自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浙江的宁绍地区(分别占 9%和 9.8%)。需要补充的是,对个人而言,上述几种原因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如对较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来说,进城打工既为了赚钱,也为了领略城市的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还通过与当地人结婚的方式取得在市区或郊区的居住权(如与当地农业户口结婚可迁移户口)。可见,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可以大大减少人口流动的数量,但不会使人口流动这一现象消失。

以上分析反映了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的综合影响。不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又有其自己的特点。首先,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口及劳动力的结构性老化相结合,使城市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主动消化了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土地高度集中或其他原因导致大量农民进城^[15],而中国是由于人多地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且难以就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导致农民进城。由于中国农民数量极为庞大,由农民进城所产生的现实压力和潜在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第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已成为吸收内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这一点是中国特有的农村人口迁移途径。

当然,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后,在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对上海的环境也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上海本来就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在增加了 250 余万外来人口后,全市平均人口密度提高了 21.7%,而近郊区人口密度提高了 35.4%(表 4),这给上海的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增加了不小的压力。特别是流入上海的外来农民数量已超过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相当一部分人只能通过非正式手段维持生活,甚至铤而走险。因此,如何保持外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是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表 4 上海市分区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密度	外来人口密度	实际人口密度
中心 10 个区	22873	4463	27336
近郊 4 个区	1730	613	2343
郊县	809	110	919
全市平均	2042	443	2485

资料来源:王午鼎主编: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995。

三、有序疏导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思考

在城乡拉推力作用下的农村人口流动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积极引导农村

人口流动,才能保障国家及城市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必须在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上制定积极合理的措施。

城乡差异是导致农村人口流动的宏观背景。对国家政府而言,可以采取的政策有:

1. 在农村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业已十分尖锐,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有助于减缓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2. 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缩小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内地农村人口向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的流动,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地间的收入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进而有助于减少人口流动的数量。

3. 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投入,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市场体系。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定限度。内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除一部分可能就地转化外,相当一部分将继续以务农为主。为了保障这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国家应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同时需要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市场体系,如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收购销售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农业生产和农民人寿的保险市场等等,以稳定农业生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探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符合国情的劳动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业的可能性,如发展生态农业,做到少投入多产出。另外,应运用科学技术加强中低产田、滩涂、山地、草原的合理开发,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

已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已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新生代,但他们仍被视为过客,不能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长期以来,必然产生社会问题。对城市政府而言,应考虑以下一些措施:

1. 应保持外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在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避免过量农村人口涌入对城市产生的冲击。

2. 大城市郊区可首先放宽户口政策,允许外来人口在一定条件下在郊区县城或小城镇落户从事工商业活动。

3. 有条件地逐步放宽市区的户口政策。为吸引外省人才和国内外资金,上海实施了蓝印户口政策,但此政策过严,迄今仅一千人得到蓝印户口。如该政策规定,境外人士购买商品住宅在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者可申请一个蓝印户口。现实情况是,上海已积压近 400 万平方米的商品住宅,不少外省人士希望购买,但限于户口政策不让购买^[16],这种对境外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是不妥当的。再如,现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女性同本市男性结婚,可是不但她们得不到市区户口,子女也得不到市区户口,如此下去,子女的教育及就业都将受到很大影响。据报载,上海市民和外来妹结婚的数量每天已达 30 余人,占结婚户的 15%^[17]。这一趋势若持续下去,现行政策所产生的负效应显而易见。因此,可借鉴国外对婚姻移民的做法,首先让子女进市区户口,再逐步让上海市民的配偶转为市区户口。

当然,城市在逐步放宽户口的同时,也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外来人口的素质,使他们逐步与当地社会融合。

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点。政策的制定应发挥其正面作用,减少负面影响,以使城乡都能得到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Lewis, W. Arthur(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139 - 191.
- 2 Ranis, Gustav. and J. C. H. Fei (1961)“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533 - 565.

- 3 Massey D. S. et. al,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431 - 466.
- 4 Todaro, M. P.(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38 - 148.
- 5 Stark, O. and O. 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73 - 178.
- 6 Piore, M. J. (1979)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陈吉元主编.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46页.
- 8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 33页.
- 9、12、13、14 王午鼎主编. 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
- 10 上海市统计局编. 1995上海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年.
- 11 高国芳等. 浦东内联企业的现状及特点分析. 浦东工发, 1996年, 第1期:18-20页.
- 15 辜胜阻.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16 《新民晚报》, 1996年5月30日.
- 17 《新民晚报》, 1996年9月17日.

中外动态

山东寿光为“少生快富，建国策大棚”

近年来，山东省寿光市靠种菜发了家，连续三届跻身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在全国百名农业大县中位居第三名，提前步入了小康。同时，菜农人口也迅速增加，到去年达到6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8%，成为该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服务对象。

寿光市委、市政府有鉴于此，顺应农民不断提高种菜水平和要求致富的愿望，自去年以来，责成计划生育部门牵头，农委、农行、供销社等涉农部门和各乡镇采取得力措施，帮助菜农少生快富，并把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列为优先扶持对象。各乡镇农行和计划生育“三结合”基金会首先行动起来，为这批人设立了专项信贷资金，其中仅“三结合”基金会就贷出60余万元。菜农利用这批资金新建冬暖式大棚7万个，称之为“国策大棚”。

为使菜农的技术更全面，该市利用乡村两级人口学校，聘请经验老到的技术人员进行普及性技术培训，逐步加入美国滴灌、CO₂气体施肥等新工艺和佛手瓜、葡萄等新兴大棚瓜果蔬菜种植技术培训，据统计参加过培训的不少于50万人次。在此期间，计划生育人员向他们公布各地蔬菜新技术和价格信息，每堂课利用十几分钟讲授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实用性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知识。各乡镇供销社优惠向他们提供农药、农膜，种子站优先供应蔬菜优良品种。两年的努力收到理想的回报：菜农的蔬菜纯收入达到人均1800元，比两年前提高了近800元。

“国策大棚”给农民带来了好处，农民也回报计划生育工作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目前开展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的村达到100%，计划生育率、晚婚率、晚育率分别达到99.8%、98.8%、99.8%，均创历史最好水平，胡营乡还出现了11支群众自发组织的宣传队，到处宣传计划生育知识。

(张少勇)